

##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第一節、國高中階段補習與教育成就

本節將從各項文獻討論家長安排國高中子女補習安排的情形。由於該階段的學生將面臨升學考試，故本節在補習活動與升學機會及教育年數的關係上，也會多所著墨。針對補習傾向與升學機會及教育年數的關係，研究方法通常是以資料庫與問卷為主。使用資料庫研究者，重點多放在各種變數在世代間對補習行為與升學機會及教育年數的影響。本節當中，除林忠正、黃璿娟(2006)的理論模型之外，其他文章中所列出解釋變數與補習或升學的關係皆列在附表一、附表二中。

林忠正、黃璿娟(2006)跳脫討論「人人皆補習」時所採用的賽局模型，認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過程當中，即使違反某些規範，會讓自己感到罪惡感、讓其他人指責或損害他人利益。但只要社會上違反此規範的人數到達一臨界點，就會讓這種罪惡感減輕。因為上述假設，經濟模型設計兩個變數：一個是「補習相對於不補習所要負擔的心理成本」，另一個是「補習的心理負擔與補習風氣的關係」。結果發現，可能是因為過去台灣聯招的較低錄取率，讓補習風氣擴張到幾乎人人都選擇補習，也讓參與補習者的心理壓力因為大家都補習的因素而變得極低，使得即使後來錄取率一路上升，只要錄取率未達百分之百或是明星學校沒有被消滅的話，補習風氣也不會有衰退的跡象。

章英華、伊慶春(2001)指出，若是家庭已經能提供較佳的教育資源，或是學校及個人本身競爭力足夠時，此時補習是一種增強現象；若家庭資源較為缺乏，或是學校及個人競爭力不足時，補習就是一種補救。研究以國三學生的問卷資料發現，在台灣，補習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是增強現象，而非補救現象。這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解釋：

- 1) 城鄉差距與辦學聲望：此處考量到台灣的跨區就讀現象，在城鄉差別的部分設定為學校所在地，而非學生居住地。理論上聲望高的學校，學生可以直接在學校獲得充足的教育資源，而不用校外補習。但就問卷中的實證研究發現，台北市中心學生校外補習的傾向相較於台北都會區的其他區域是比較高的，這樣的結果支持另一假設：在聲望高的學校，學生可能因為感受到的競爭壓力更強，反而會選擇向外「求援」。
- 2) 家長教育程度：家長教育程度若在高中職以上者，相對於家長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者，其子女較容易參加校內課業輔導或校外補習。家長教育程度在大

專程度者，相對於家長教育程度在高中職而言，其子女又傾向參與課外補習。

- 3) 家庭經濟：家庭所得愈多，國中生參與校外補習的傾向愈強。而認為家庭經濟對自己發展愈有益者，在校內課輔之外再參加校外補習的機會也愈高。
- 4) 兄弟姐妹數：一般來說，若兄弟姐妹數較多時，代表每個人分到的教育資源較少。兄弟姐妹較多的家庭，子女參加校外補習的意願較低，且參與校內課輔的意願高於校外補習。
- 5) 學生本人的競爭力：基本上只有功課落後很多進而影響到升學意願的學生參加校外補習的傾向較弱而已。另外若以班上排名觀點來看，六至十名參與補習的傾向最高，其次為前五名，11~20名排第三。

孫清山、黃毅志(1996)透過資料庫研究家庭背景對教育及補習的關係，在補習行為方面，就進入國初中後升高中職或五專的人，以及進入高中職後升大學或二三專的人，研究各項背景因素對補習項數以及補習方式之影響；該研究將補習方式分為校內課業輔導、上補習班與家教三方面進行討論。結果顯示：

- 1) 出生地的都市化程度：此變項對於補習項數的影響並不顯著，但對於補習參與方式就出現區別。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無論在國初中及高中職階段，參與校內輔導的機會降低，但上補習班的機會變高。
- 2) 性別：女性的補習項數不論在國初中及高中職階段，皆不如男性。若就補習方式而言，無論在國初中還是高中職，相較於男性，女性上補習班的機率較低。
- 3) 兄弟姐妹數：事實上僅在國初中時，兄弟姐妹愈多，會減少補習項數及校外補習的機會。上了高中職之後，無論在補習項數及補習方式方面，兄弟姐妹數的影響皆不顯著。
- 4) 出生年次：出生年次愈高(愈晚世代)的人，在國初中階段的補習項數較出生年次較低(愈早世代)的人多，且在補習方式方面，出生年次較高的人無論在校內課業輔導或上校外補習班方面，參與率亦較高。進入高中職之後，則僅在校內課業輔導上與出生年次較低的人相比較為顯著，其他如補習項數與校外補習方面皆不顯著。
- 5) 父母教育程度：就父親教育程度而言，父親教育程度愈高，則無論在國初中階段，抑或是高中職階段，子女補習項數皆明顯較多。另外父親教育程度較高，在國初中階段會減少子女參與校內輔導的機率，但在高中職階段會增加子女校外補習的機會。母親教育程度對子女補習的影響力並不如父親教育程度，只有在國初中階段時，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子女補習項數及上補習班的

機率才會明顯增加。

- 6) 父親職業：父親如果是雇主時，子女無論在國初中及高中職階段的補習項數，皆明顯高於父親為其他職業者。此外若父親是雇主，子女上補習班的機會也較高。

另外在補習與教育成就的關係方面，若在國初中階段，無論由補習項數與補習方式觀點來看，參與補習而升上高中職的機會皆比較高。而在高中職階段，參與補習對於升大學明顯有幫助。

劉正(2006)以資料庫中的國中生樣本，發現補習在台灣日漸普及，階層、性別乃至於父親職業之間的差異已經不明顯，而中等家庭收入與父母為中等學歷的家庭，安排子女補習的機率最高；值得一提的是，若父母學歷在研究所以上者，子女參與補習的比例反而不如父母學歷在高中職、大專者。作者對於此現象提出兩種解釋：一是父母學歷特別高時，會比較有意願自己解決子女課業上的問題。二是他們較為反對補習。若是就城鄉差距而言，僅有男生的補習機率會因為就讀國中地區的不同而有差別(都市大於鄉村)，女生的補習機率就城鄉而言差距不大。林大森、陳憶芬(2006)運用同一資料庫的大一新生樣本作分析，發現由於補習產業擴張，雖然父母教育程度愈高與家庭收入愈高，子女的補習科數也會增加，但整體來說，個人背景與社經地位對學生參與補習與否的影響力已不大。且就補習的成果而言，補習愈多，效果反而會變差，尤其高一、高三的人文社會領域專門科目，及高一的自然科技領域專門科目更是如此。作者對這種現象的推論，是由於有些考生為了考好學科能力測驗及指定科目考試，會報名參加「一貫班」或「全科班」，但實際狀況是，補得愈多，成績不見得會以正比成長，反而會落入所謂「愈補愈大洞」的窘境。

Stevenson、Baker(1992)研究日本高中生的補習現象，將補習分為模擬考班、函授、家教、一般補習班與重考班，針對各項背景變數與補習形式之關係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男性較女性傾向選擇模擬考班、函授與重考班，女性則傾向選擇家教。就個人在校成績而言，成績愈好愈容易從事補習。就父母教育程度而言，父母親教育程度愈高，子女參與補習的機會亦愈高。就家庭經濟而言，若家庭收入愈高，則參與家教及一般補習班的機會亦愈高。就城鄉而言，除函授外，城市的高中生及辦學聲望較佳的學校的學生，參與補習的機會較高。接著針對補習種類與升大學機會進行研究，發現模擬考班與函授班對於高中後考取大學有所助益，而家教對於重考大學卻有負面影響。

羅淇(2004)透過資料庫，對 1935~1963 年出生者(該研究稱為親代樣本)與 1978~1984 年出生者(該研究稱為子代樣本)做世代之間補習的比較，並將補習分為校內補習與校外補習，提出以下結論：

- 1) 就學校所在地而言，若就讀的國中位於城市，則補習的機會較大。
- 2) 父親為公教人員時，無論在那個世代，子女的補習機率及校外補習機會皆比父親為其他職業者高。
- 3) 就 1978~1984 年出生者而言，女性參與補習的機率皆比男性高，且不分校內與校外補習。
- 4) 對 1935~1963 年出生者來說，兄弟姐妹數愈多，參與補習的機會愈小；而在 1978~1984 年出生者方面，僅有在校外補習時，兄弟姐妹數愈多，參與補習的機率愈低。
- 5) 就學校種類來說，就讀公立國中的學生參與補習的機會較高，且校內、校外補習皆然。
- 6) 若國小時有參與補習，則不論在那一年出生，在國中時參與補習的機會也比較高，尤其是校外補習。

另外就升高中而言，若以補習方式做比較，則校外補習對升學的影響較校內補習顯著。若以世代做比較，則在父母世代補習對升學影響的效果較為顯著，顯示補習對升高中的影響，隨著世代變遷而有逐漸減小的趨勢。

## 第二節、國小學童安親補習、暑期活動與才藝補習

本節有關安親課輔班的文獻，大部分是採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做研究，部份文獻則採用訪談方式進行研究。由於研究方法的限制，研究範圍多以單一縣市為限。部份文獻由於研究者背景，主題以單一科目為主。

吳麗芬(1993)的「國小學生補習狀況問卷分析」，針對國小及國一學生與其家長與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發現當時已有 79.8%的學童參與課業或才藝補習，其中參與課業補習的學童即佔 54.1%。從年級區分來看，年級愈高，課業補習比例愈高，但才藝補習和學童就讀年級則無太大關係。從家長教育程度來看，教育程度愈高，子女課業補習比率愈低，但才藝補習比率則愈高。就地區而言，高雄地區學童課業補習率則居首位，而才藝補習率因受到當時自學方案實施的影響，亦名列前茅。

Hsieh(2001)以台北東區某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學生為母體，探討學童上補習班

與其數學成就的關聯，並分析父母的教育成就與學童上補習班的關係。結果發現，若分析父母教育成就與學童上補習班的關係時，則三、六年級學童父母教育成就愈高，學童補習的機會較低。如果從學童年級探討上補習班與否，則學童年級愈高，上補習班的機會愈大。如果分析學童上補習班與數學學習表現的關係，則在國小六年級的階段，上補習班的學童會有較好的數學成就；而參加補習的三年級學童在數學成就上卻不如未補習的學童。

郭家華(2005)以雲林某鄉鎮的單一班級為樣本進行質性研究，發現學童校外補習的情況是「歷史下的產物」，一方面因為家長工作或是沒有能力指導課業，另一方面也因為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的緣故，加上補習確實可以在短期內提升學業成績，以及彌補學校英語與才藝教學的不足，讓補習班愈來愈蓬勃發展。另外針對不同家長階級學童的補習情形，也發現家庭經濟資本較多者，比較會安排學童參加才藝類補習。家庭經濟資本較少者，學童補習與否則完全視經濟能力而定，才藝補習方面也較注重實用性。

同樣針對數學補習，黃雪萍(2002)即以訪談的方式發現，除了父母的期望及課程內容超越家長可指導的範圍外，學童自己的自我要求有時也是參與數學補習的因素之一。再者就補習班與學校老師的比較，補習班教學以大量練習為主、教學進度亦快於學校，且教學亦較嚴格，也是使補習班受到家長青睞的其中原因。該文也透過學校數學成績的比較，證實補習之後，大部分學童的成績的確有進步。雖然如此，文章亦指出，補習班指派的作業，不僅加重學童的負擔，亦影響其學校正規作業的品質。且補習班的超前進度教學，會導致學童面對學校課程時，產生不專心的情形。

陳嘉琳(1999)針對夏季失落的現象進行本土研究，發現在台灣也有如國外般夏季失落的現象。若父親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及每年年收入愈高，則就以下三項資本方面提出結論：

- 1) 經濟資本：子女在暑期補習的花費也愈高。
- 2) 社會資本：親子互動及一起做功課方面的經驗亦較豐富。
- 3) 文化資本：在一般文化資本，如安排子女參與才藝班的經驗較為豐富；但若就學業文化資本而言，子女在參與各種班別的時數並無顯著差異。

另外就暑期後的學業成就而言，無論是國語與數學科，經濟資本、學習相關社會資本(如父母和子女討論作業)、一般文化資本都對兩科的成績有正面顯著影

響。

邱定雄(2001)以彰化縣的國小學童為樣本，以問卷方式，用行銷的觀點去探究學童上安親課輔班的比率與影響就讀中大型學校與小型學校子女的家長消費行為的因素。結果發現，就讀「城市區域學校」的學童比「鄉村區域學校」的學童多上安親班，且家庭所得愈高，學童愈容易進安親班。至於家長的教育程度與學童性別並不會影響子女上安親班的比率。

王文崇(2005)以高雄市國小學童為母體，使用問卷探究不同生活型態的家長選擇校內安親班或校外安親課輔班的差異情形。結果發現，選擇校外安親課輔班家長的比例，是校內安親班的三倍左右，故收費並非選擇安親課輔班的重要考量，能夠物超所值才是消費者關心的重點。

洪郁年(2005)是眾多探討安親課輔班的文獻當中使用質性研究方法的論文。該文以高雄林園的國小學童為母體，比較學童家長在補習班提供的教學服務等各項因素的重視程度之差異性，結果發現隔代與非隔代家庭、單親與雙親、家長職業與教育程度等都是影響選擇補習班的因素，並且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得知，補習費用高低與口碑對於補習班的選擇較為重要。

張春桂(2004)針對台南市國小學童的課後補習狀況以問卷方式進行研究，對於安親抑或是補習的爭議，首先指出，事實上課業輔導與托育是可以共存的，並非涇渭兩分。

其次，在家長為孩子安排補習的行為方面，發現最主要動機是培養孩子能力，其次才是加強學校課業。該研究發現，參加課後補習的學童以高年級居多，而參加三項以上才藝補習的學童則多為低年級學童，中、高年級學童多傾向不參加。若以性別區分，則女性比男性參與較多才藝補習，但在課業補習方面則無明顯差異。收入與社經地位愈高，則參與才藝補習種類則愈多，但對參與課業補習與否則無明顯影響。未參加課後補習的學童以低年級居多。針對未安排子女參加補習的家長探究其未安排補習的原因，最主要是因為補習班的收費與態度問題所導致。